

本卷提要

本卷在以往各类思想史的基础上,侧重考察了隋唐五代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思潮、时代心理以及各个学术流派、重要学术著述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所做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

重建一统的隋朝即已显露出这一时期思想演变的趋势。唐朝前期的思想发展具有极大的总结性和兼容性。在盛世过后的反思过程中,“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出现一次高峰,传统思想进一步被清理,先前各家学说对峙、论争的局面渐渐转而为吸收、融合的趋同气象。晚唐暨五代对自然、社会与人的认识,关于辩证思想的成就,都为斑斓的中古思想发展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目 录

中国隋唐五代思想史

一、隋唐五代思想概述	1
二、隋朝的思想发展	4
(一)思想领域的基本态势	4
1. 儒、佛、道思想的对立	4
2. 三教趋同观点的提出	6
3. 官方的方针	8
(二)王通的思想	12
1. 生平 and 著作	12
2. 明王道	13
3. 三教可一	16
三、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	18
(一)贞观君臣“以古鉴今”的意识	18
1. 太宗“以古为镜”	18
2. 古镜皆“为治之具”	19
3. 修史以“览前王得失”	21
(二)注重“人事”的“取鉴于亡国”	23
1. “取鉴于亡国”思想的演进	23
2. 取“亡国之君”为戒	24
3. “取鉴”的基本特色	27
(三)兼通众意的“取鉴乎哲人”	30
1. “取鉴乎哲人”的提出	31
2. 兼取“众家之意”的思想	32

四、重振儒家思想的尝试	35
(一)对儒家思想正宗地位的重新确认	35
1. 选拔儒学之士	37
2. 兴学培养后继人才	38
3. 以崇儒为基本国策	39
(二)官方对经学的统一	41
1. 颜师古与《五经》定本	41
2. 陆贽明与《经典释文》	43
3. 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52
五、儒、道、佛思想论争	64
(一)三家并立的基本国策	64
1. 对儒、道、佛的认识	64
2. 尊崇道教	67
3. 扶植佛教	69
(二)儒家思想对佛、道的驳论	72
1. 傅奕上疏废佛	72
2. 狄仁杰、姚崇的援佛反佛	74
3. 辛替否的援佛反佛	77
4. 吕才、李华、卢藏用的反迷信思想	79
(三)佛、道思想交锋	83
1. “夷”夏尊卑之辩	84
2. 礼法人伦之辩	85
3. 社会影响之辩	86
4. 老子化胡之辩	87
六、学术思想的系统反思	90
(一)刘知几著《史通》	90
1. 刘知几生平	90
2. 以史为主,错综经纬	93

(二)《史通》的思想特色	96
1. 求实录与扬名教	96
2. 疑古与惑经	101
3. 天人论与变易论	109
七、经学思想的重大变异	119
(一)社会变动引出“思想危机”	119
1. 异端斯起,学说林立	119
2. 反思中的困惑	122
(二)《春秋》新学的兴起	124
1. 一个独特学派的形成	125
2. 颇具特色的解经新意	126
(三)从历代评论看其影响与地位	133
1. 救乱之旨影响久远	133
2. 《新唐书》的苛责	134
3. 理学大师们一致称赞	136
4. 几点结论	137
八、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	139
(一)杜佑纂《通典》的旨趣	139
1. 杜佑生平	140
2. 从“体要”探“政理”的经世意识	141
3. 全新的社会结构说	144
(二)《通典》的非古是今	147
1. 古今既异,形势亦殊	147
2. 欲行古道,势莫能遵	149
3. 随时立制,既弊而变	152
(三)《通典》的历史地位	155
1. 思想史上的地位	155
2. 学术史上的地位	158

九、中国古代“天人论”的基本总结	162
(一)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生平	162
(二)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163
(三) “天人不相预”和“天与人交相胜”	166
1. “天人不相预”	167
2. “天与人交相胜”	170
(四) 顺人、重势与理、数、势	173
1. 柳宗元的顺人、重势	173
2. 刘禹锡的理、数、势	175
十、道学先驱者的思想	179
(一) 韩愈的思想	179
1. 道统说	179
2. 性三品与情三品	184
(二) 李翱的思想	186
1. 去情感以复性	186
2. 格物以致知	189
十一、儒、佛、道思想的相互借鉴与融合	192
(一) 佛教对儒、道的借鉴	193
1. 佛教借鉴儒学的一般状况	193
2. 佛教的中国化——禅宗	194
3. 佛教对道教的借鉴	197
(二) 儒学对佛、道的吸取	198
1. 柳宗元“统合儒释”	198
2. 刘禹锡“援佛入儒”	200
3. 李翱“以佛解儒”	202
4. 儒学对道教的吸取	203
(三) 道教及道家思想对儒、佛的吸取	205
1. 对儒学的吸取	205
2. 对佛教的吸取	207

十二、晚唐的思想	213
(一)“剥非”与“补失”的经世思想	213
1. 直指时病俗弊	213
2. 推崇“遗统”以救世	216
3. “取天下以民心”	217
4. 相面之“诞妄”	219
(二)对自然、社会与人的深入思考	223
1. 自然起源与人类进化	223
2. “无欲而无私”的为人处世观	226
(三)反专制思想与辩证思想	228
1. 反专制思想的萌芽	229
2. 辩证思想的发展	232
十三、五代时期的思想	239
(一)思想领域的趋势	239
1. 道教思想的时代特点	239
2. 儒学受到冲击	241
3. 佛教禅宗独盛	242
(二)《化书》的思想成就	243
1. 谭峭生平	243
2. 万物皆化的朴素辩证观	244
3. 恤民、均食、重俭的社会政治观	246
十四、结 语	254

一、隋唐五代思想概述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出现全方位变异的时期,处于承上启下的转折地位。把握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脉络,上可探其发生之源,下能见其演进之流。

刚刚经历了两晋南北朝“华夷”、中外思想初步融合,重又进入统一的隋朝,思想领域已经显露出其后演变的趋势:儒学危机、天命论衰落、佛教复兴,出现儒、道、释“三教可一”的主张。

唐朝前期繁荣兴盛,呈现出开放、外向、自信、进取的时代风貌和社会心理。思想文化的发展,普遍富于兼容性和总结性。贞观君臣以古鉴今求“致治”,使这一传统思维方式大加发扬,把古代的鉴戒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汉唐之际经、史两大部类俱已成学,其思想发展在唐朝前期分别得到系统总结,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五经正义》和《史通》。西方世界传入中土的佛教思想,虽然遭到传统的儒学思想、道教思想的顽强抵制,但它仍然不时适应着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各种碰撞中渐渐渗透到中华大地,生根、开花。佛教各宗派在唐朝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主张等,详述于宗教卷。

渔阳鼙鼓震惊了沉溺于“盛世”之中的整个社会,当人们清醒过来之后,普遍地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政治危机,导致“思想危机”,出现了所谓“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状况。

藩镇抗命、皇权跌落的现实,更是对官方统治思想的直接挑战!于是,思想领域的变异最先出现在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经学、儒学中。《春秋》新学兴起,产生出两个方面的影响。其“救弊”之旨,成为后世“托古改制”的思想先导;其“黜乱”之旨,又与先期道学彼此相通,成为经学向理学过渡的一个特殊环节。

唐政权由盛转衰,“言理(治)道者众”,纷纷为“救弊”求治寻找新的思想学说。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思想进一步被清理。已经衰落的天命论思想,在柳宗元、刘禹锡的论辩声中宣告终结。杜佑纂修《通典》,从“体制”变革中探“理道”,成为思想史上“非古是今”经世思想的第一个高峰。韩愈建起“道统”的体系,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唐政权走向败亡,但毕竟为已经衰微的官方儒学思想找到一条最佳出路,被其后的继之者发展成为理学。

社会心理的巨大失落和官方思想的面临危机,使得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由向下层社会的渗透转而对“上流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以至出现“统合儒释”的呼声。不过,最终表现出来的却是偷偷的“援佛入儒”,并改变着传统的儒学,但在口头上则又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就整个思想领域而言,先前各家学说对峙、论争的局面已成为过去,呈现出一派彼此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同气象。

晚唐暨五代思想的发展,除了明显的时代特色外,颇有一些富于光彩的思想学说。鉴于宋代以来推崇中唐始成的“道统”思想,掩饰了这些学说的光亮。对此,本书作了一些新的发掘,以示不没其实。

在此前各思想史的基础上,侧重考察隋唐五代社会思潮、时代心理以及各重要学派、重要学术著述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所做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是编写本书的基本

宗旨。基于这一考虑,形成上述总体认识,并确立起全书基本框架。

二、隋朝的思想发展

隋朝是个时间短促的王朝,从公元 581 年杨坚称帝,到公元 618 年杨广被卫士缢死,只有 37 年时间。然而,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 400 年的长期分裂局面,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根据大一统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所建立的一些制度(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兵户编入民籍等)对唐朝乃至后世产生着影响,为大唐盛世的出现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著名儒学思想家王通的某些观点,被后继学者不断深化阐发,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思想潮流。

(一)思想领域的基本态势

儒、佛、道三家思想存在着较大的对立和分歧,各家思想都试图取得独尊地位,压倒其它二家,倡三教合一的呼声还很微弱。隋官方的思想方针是,三教兼用,以儒为主。

1. 儒、佛、道思想的对立

在隋文帝、隋炀帝时均举行过儒道佛的辩论,由各方的有理论素养且又能言善辩者参加。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隋文帝召集儒、佛、道三方代表辩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

威等人,另外二方是僧人彦琮,道士张宾。《老子化胡经》系根据汉末流传的“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故事编成,据说最后成书于东晋道士王浮之手。道教徒以此经证明道教高于佛教,释迦佛为老子的徒弟。而佛教徒深感愤怒,一直要求官方下令查禁该经。双方的争辩当然是火药味十足的,而儒方与此辩题关系不大。僧人彦琮在辩论后仍深感不平,又作《辩教论》驳斥《老子化胡经》之伪。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在智藏寺又进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主持人是始平令杨宏,辩论的主角是道士余永通和僧人慧净。程序是,由一方先立一义(定个理论命题),由另一方进行诘难,然后往复问难,谁最终理屈词穷就是失败。辩论前,双方都想争取主动,争着先立义。慧净认为,在佛寺辩论,僧为主人,当先立义。杨宏未允许。于是道士余永通先立“义”,为稳操胜券,他搬出了老子《道德经》中开头对“道”的定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他大概是以以为,用模糊语言形容朦胧神秘的“道”,对方是难以批驳的。然而,佛学注重逻辑思辨,因明学已成佛学中一专科学问,因此僧人言谈的逻辑性是较严密的。慧净马上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对方概念上的模糊处找漏洞,他反诘道:“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①《道德经》在谈“道”生成之后,“道”又生万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僧人慧净则以上述说法前后矛盾而证明其谬,他巧妙地反问,有物混成,是什么在混?是一个本体在混,还是二个本体在混?若是一个本体在混,那么在

^① 此据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754-755页。

将要混之前，它自己已成一，因此，一不是道生。若是二个本体在混，那么未混之时，就已经是二，所以，二也不是由一所生。

隋代的三教辩论是真正唇枪舌剑激烈进行的，有时用语尖刻，冷嘲热讽，以让对方下不来台为快事。全不像中唐后的三教辩论那样心平气和，那样从容地讨论教义的异同。

儒学以阐发、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讲求忠君孝亲。而隋代的僧人尚未打算向儒家礼教妥协，仍很坚定地遵守佛教的不拜尊亲之规定。他们认为，出家人已超越世俗，不能向君王臣僚下拜。由于生死轮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不固定，因此出家人也不拜父母。儒者经常据此攻击僧人不讲忠孝，悖逆君亲。有时，皇帝也亲自出马，要求僧人服从礼教。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下诏说：“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可是，僧人不执行此令。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僧、道在一次共同朝见炀帝时，道士下拜，而僧人直立不动。炀帝责问，条令已下许久，僧人为什么不向君王致敬？僧明瞻回答，陛下弘护三宝（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就应当顺从佛言，佛经中不令僧人拜俗，所以不敢违背教规。炀帝仍然坚持要僧人下拜，明瞻无奈，只好说：陛下如一定要僧人下拜，那么僧人要先脱法服（袈裟），再穿俗人衣服，然后下拜。炀帝一时语塞，此事不了了之。

2. 三教趋同观点的提出

在历史上广为流传的《颜氏家训》，其作者颜之推在隋代为内史。他提出了三教趋同的观点，《颜氏家训》一书，就兼融了儒、佛、道思想。其中的《归心篇》认为儒、佛二教“本为一体”，佛教为内教，儒学为外教，在对于人的教化方面有不同的分工。佛教“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不饮酒)；而儒学“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他认为，佛门“五戒”与儒家“五常”含义相符合，“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既然儒、佛义旨相通，那么世人对佛教的指责就是一种糊涂表现，“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颜之推甚至认为，在义理方面，佛教是有大大胜过儒学之处的，“原夫四尘五阴，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①看来他确实对佛教思想有所了解，不是泛泛的无根之谈。他的上述说法是颇有见地的，他已看出儒学的短处所在，没有像佛教那样对人的心、性、欲、情等思维和感觉，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剖析。他所举出的几个佛理概念，认为圣王之道和儒学都不能企及，显然有借鉴吸取的必要。所谓“四尘”，指色、香、味、触。“五阴”，即五阴，五蕴，指色、受、想、行、识。所谓“六舟”，即“六波罗蜜多”，“六到彼岸”，指六种从此岸(生死)到达彼岸(涅槃)的方法或途径，有：布施(檀那)，持戒(尸罗)，忍(羼提)，精进(毗梨耶)，定(禅那)，智慧(般若)。所谓“三驾”，即“三乘”，即引导众生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或教说，不同佛教宗派有不同的解释，一般称“声闻乘”(以羊车喻)，“缘觉乘”(以鹿车喻)，“菩萨乘”(以牛车喻)。颜之推对佛教普度“群生”，教人“人善”的功能十分赞赏。后来儒学在唐代发展的事实，证明颜之推预见到了儒学将借鉴佛教心性理论以改造自身的思想潮流。

对于道教理论，颜之推认为其得仙之说不可信，再加上金玉、炉器的费用太昂贵，“益非贫士所办”。但他认为道教的养生

① 《颜氏家训·归心篇》。

说可以吸取，“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居，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①

隋代名儒王通也有三教可一的观点，我们要在本章第二部分讲到，此处省略。

3. 官方的方针

在结束中国的长期分裂战乱后，隋文帝杨坚是相当踌躇满志的。他又开始着手进行巩固隋王朝统治的工作。杨坚懂得，若要维持统一的大帝国长治久安，必须加强思想领域中的控制。

在儒、佛、道三家思想中，哪一家更适于作为第一位的统治思想呢？杨坚选择了儒学。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王朝刚刚诞生，文帝就下诏宣布官方思想方针，“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认为乱世之后首先要以儒家礼教来收束人心，使“家慕大道，人希至德”。《隋书·儒林传》也记述了文帝在隋初的重儒之举，“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文帝又颁诏书，重点在于进一步普及儒学，要求内外官吏和黎民百姓都要学习儒学，作为言行准则，彻底杜绝不轨不法行为。但隋文帝在晚年改变了重儒的方针，他精力衰退，进取心泯没，“不悦儒术，专尚刑名”，上行下效，“执政之徒”也“咸非笃好”儒学之士。隋文帝竟又走向废儒的极端，“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

① 《颜氏家训·养生篇》。

人。”^①“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②

隋炀帝即位后，对文帝晚年废儒之举有所纠正，《隋书·儒林传》序称炀帝“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炀帝刚刚即位，大概是由于弑父杀兄才谋得皇位，心里格外不踏实，于是愈加做出励精图治的样子。他重新推崇儒学，让儒者为长治久安出谋划策，“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刘炫、刘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播绅咸师宗之。”先是隋文帝实行科举取士，接着隋炀帝又“建进士科”，以经取士，读儒经成为普通读书人跻身于统治阶层的阶梯。科举制的创立，为儒学最终牢固确立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科举取士是选拔各级官员的最主要途径，从上到下一系列科举考试，考核的是儒经，而不是佛教、道教之书。这样，选拔出的儒生又居于各地、各级官位上，保证了儒学成为居第一位的统治思想。

炀帝进一步提高孔圣人的地位，加封孔子后裔，隋文帝封“孔子后为邹国公”，炀帝“改封为绍圣侯”。炀帝扩大内廷讲论儒经的规模，“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精于儒学“三礼”的江南儒生褚辉，在公开讲论时，“博辩，无能屈者”，被擢为太学博士。炀帝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下诏宣称儒家礼义是做人的根本，“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他还认为，光在上层提倡儒学还不行，还需加强对民间的引导，于是遣使去各地推广儒学礼教，优奖孝悌之人，旌表义夫节妇。炀帝一再宣称，君民建国，以儒教为先，去浮伪之世风，从今做起。

① 《隋书》卷75《儒林传》序。

② 《隋书》卷2《高祖纪下》。

但是,当炀帝以为自己的根基已牢之后,仗恃天下富足,就开始倒行逆施起来,“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这种社会局面给儒学带来严重损害,“空有建学之名,面无私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指儒者),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寇之心,相与陷于不义。”^①隋末的黑暗政治和社会动乱,使儒学大伤元气。因此后来唐初又花大气力进行了儒学复兴工作。

隋统治者在尊奉儒学的同时,对佛教、道教也积极扶持和利用。隋文帝、隋炀帝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倾向性,既不坚持崇佛抑道,也不坚持崇道抑佛。尽管有时对二教的政策有些调整,但文帝、炀帝始终都把二教看成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如果某一教有脱离控制的苗头,则马上采取制约措施。以往有的学者在研究隋代道教时,则说文、炀二帝崇道;另外有学者在研究隋代佛教时,则称文、炀二帝崇佛。其实,二帝均是根据自己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而侧重利用某一教,并无重此轻彼之意。

隋文帝杨坚出生在般若寺,有尼姑智仙称此儿有异相,不可养于俗世,于是杨坚在寺院被尼姑养到13岁才还家。尼姑预言杨坚为“天佛所祐”,“晚得天下”。^②有此一段因缘,杨坚即位后除大建寺塔,广度僧尼外,还下诏整理佛经,辨别良莠真伪,又令各地由官方出资抄写佛经置于佛寺,另又抄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③他利用佛教为自己罩上灵光,下敕称:“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

① 《隋书》卷75《儒林传》序。

② 见《隋书》卷1《高祖纪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

③ 《隋书》卷35《经籍志四》。

是人尊，受佛付嘱。”^①在佛教拥有广大信徒的情况下，连皇帝也愿从佛那里获得一份在位的合法性。

杨坚篡周自立，得到道士的大力协助。北周末年，杨坚执掌大权，欲以禅代方式当皇帝，急需“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焦子顺得此信息，马上宣扬杨坚非人臣相，有符命在身，及时为废周建隋造了舆论。杨坚“受禅”后，让张宾当华州刺史，让焦子顺在皇宫附近建五通观。把开国年号定为“开皇”，出自道典。又下令重修道观，增度道士，并亲幸道场。^②杨坚在位期间，道观和道士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文帝下诏重申对佛教、道教的崇信和保护，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③

炀帝杨广在开皇年间曾为扬州总管，请名僧智颢为自己授“菩萨戒”，得法号“总持菩萨”。不久，杨广又写《宝台经藏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杨广”云云。杨广即位后，广造佛寺，治佛经，铸佛像，度尼僧。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下《行道、度僧天下敕》，开首即自称“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

炀帝对于道教也同样很崇信，早年镇扬州时，亲修书一封恳请道士徐则出山辅佐自己，即位后与道士多有往来，当与著名道士王远知“见于临朔宫，炀帝亲执弟子之礼，敕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④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炀帝迷信道教长生不死

① 法琳《辩正论》卷三。

②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第351页。

③ 《隋书》卷2《高祖纪下》。

④ 《旧唐书》卷192《王远知传》。